

# 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理想与困境

## ——以西欧穆斯林移民社群为案例的分析

李明欢

学科流派

**提 要** | 本文以欧洲穆斯林移民社群为对象,追踪西欧国家针对穆斯林移民社群的社会政策演变,剖析自21世纪以来西欧主要国家相继摒弃多元文化政策的前因后果,思考近30年来主要西欧国家对待外来移民的宗教文化政策可能给予我们的教训与启示,并对当代多元文化论争进行再探讨。

**关键词** | 多元文化论 社会政策 穆斯林社群 西欧国家

**中图分类号** | C922

**作者信息** | 女,1953年生,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361005。

### 一、欧洲穆斯林移民社群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欧洲曾经长期是一个人口不断向外迁移的大陆,据美国人口学家的统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从欧洲移居到北美新大陆的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伴随着战后重建、经济发展的需要,欧洲迅速转变为移民输入国。20世纪60~70年代是欧共体国家大量引进外籍工人的年代,据1975年统计,当时欧共体9国的外籍工人连同其家庭人口至少达到1200万人,比10年前增加一倍以上。<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迫使西欧各国关闭了引进外籍劳工的大门,但基于人道主义原则,以家庭团聚为主的移民通道在西欧各国继续保留,因此,新移民仍然通过原有的人脉系统源源进入欧洲。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委员会公布的2007年统计数

据,西欧国家中第一代移民总数约3635万人,移民人口规模最大的前5位国家依次是德国1014万人,法国647万人,英国541万人,西班牙479万人,意大利252万人。<sup>②</sup>

就地缘政治结构而言,从欧洲外部进入欧洲国家的移民工人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来自原欧洲殖民地的移民。例如,当印度尼西亚、苏里南独立时,当地民众可以在原宗主国荷兰与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国籍之间进行选择,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荷兰国籍并

<sup>①</sup> 斯图尔特著,陈少衡、程洪逵、顾以傲、姜海、季庄、徐汎译:《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26页。

<sup>②</sup>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国际移民”指的是“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口”,因此,这里的统计数据仅包括第一代移民。详见DESA(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07*,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8。

移居荷兰。又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原是法属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以及中国香港曾经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基于宗主国与原殖民地的特殊历史渊源,这些国家的移民也源源进入欧洲。

第二类移民来自人力资源丰富,但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欧洲近邻国家。此类型以西亚的土耳其为突出代表。据1985年统计,全欧的土耳其移民已经接近200万人,成为遍布西欧主要国家的移民劳工大军。<sup>①</sup>

英国2001年人口普查显示,英国穆斯林人口中16岁以下的人占1/3,是英国最年轻的社群。在荷兰、丹麦、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典等国,以外来移民及其后裔为主构成的穆斯林社群也已在该国总人口中占4%~5%。<sup>②</sup>

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根据各个相关国家自己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在网上制作了关于欧洲穆斯林人口分布的图表。根据该项统计,除俄罗斯之外,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人口总数约为2152万人,大约占总人口的5.6%。<sup>③</sup>如果与其他地区相比较,那么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远远低于非洲(47.81%)和亚洲(27.24%),但明显高于北美洲(2.19%)、南美洲(0.42%)和大洋洲(1.49%)。<sup>④</sup>

西欧穆斯林社群构成的另一突出现象是穆斯林人口的年轻化。欧洲是当今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在当下西欧国家劳动人口中,大约16%~20%的劳工是穆斯林。在非穆斯林人口中,青年比例约为16%~20%,而在穆斯林群体中,青年比例则高达45%~50%。<sup>⑤</sup>

大批来自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工人在西欧国家中务工谋生,虽然每天接触的是西欧的文化,耳边回响的是基督教、天主教堂的钟声,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扎根的,则是与生俱来的伊斯兰信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西欧主要城市,几乎见不到具有醒目特征的清真寺,初到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为

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往往通过私人联络而定期聚集到某一穆斯林家中的厅堂、地下室或住宅后院做礼拜,有时还会有来自其祖国的阿訇前来为其传道授业。因此,以同为“外籍工人”的身份为业缘,以共同的原住地为乡缘,再加上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神缘,就在欧洲不同国家形成了一个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穆斯林移民社群。

## 二、西欧国家多元文化政策与穆斯林社群文化

20世纪70年代西欧国家在引入外籍工人之初,从自身利益出发,普遍认为(或称“普遍希望”)他们在本国工作若干年后,就应当返回其原住地。然而,事实却未能如其所愿。就雇主而言,如果所雇用的外籍工人基本能令其满意的话,往往希望雇用8年至10年,甚至更长,以减少培训新工人的费用。就外籍工人一方而言,当他们找到一份相对安定的工作之后,往往希望将家人接到所在国共同生活。于是,面对日益壮大的穆斯林移民社群,西欧国家迫切需要调整其移民治

<sup>①</sup> “Turks in Western Europe”, <http://www.flwi.ugent.be/cie/umanco/umanco3.htm>.

<sup>②</sup> 详见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穆斯林在欧洲:国别指南”(Muslims in Europe: Country Guide),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4385768.stm>。

<sup>③</sup> 同上。如果将该数据与“世界穆斯林人口网:欧洲穆斯林”(Muslim Population Worldwide: European Muslim Population)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后者的穆斯林人口总数是207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3%。两项统计具有可比性。

<sup>④</sup> 详见:[http://www.islamicpopulation.com/world\\_general.html](http://www.islamicpopulation.com/world_general.html)。笔者查询该资料时其所显示的最后修订日期是2005年12月23日。

<sup>⑤</sup> 中国穆斯林网新闻:《欧洲新建清真寺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http://www.muslimchina.com/?viewnews-172>)。

理政策。

“多元文化”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率先实施的重要治国方略。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欧洲的瑞典、法国、荷兰、丹麦和英国等国家,也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将外来移民治理置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则指导之下。依据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原则,所有不同宗教、文化一律平等。多元文化政策不仅给予“异文化”以一定的自由空间,而且还提供特别的经济支持。例如,外来移民社团组织在所在国正式注册后,可以向政府申请活动经费,举办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各类活动,包括为移民子女开办教授本民族母语文化的专门学校。在法国,政府官员兴高采烈地参加不同族群为自己民族节日所举办的大型庆典,以示支持。在荷兰,国家广播公司专门为土耳其、摩洛哥、印度尼西亚等不同民族国家的移民开办了民族语言广播。

正当西欧国家满足于多元文化政策营造的和谐氛围时,两大重要因素影响了西欧穆斯林社群的走向。其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西方发达国家造成猛烈冲击的石油危机,对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则是以石油为武器而获得发展的机会,中东产油国经济实力因而大大增强;其二,穆斯林移民家庭的新一代在西欧土地上成长起来,他们在正规学校教育中接受了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并在走向社会时将其付诸实践。

于是,所在国提倡的多元文化政策,与穆斯林移民社群要求享有文化平等权的呼声相互交织,再加上移民祖籍国宗教界的支持,一座又一座拥有大圆顶、宣礼塔清真寺开始兴建于西欧城市,形成穆斯林移民们的精神堡垒,也成为西欧城市中的新景观。

当各地清真寺吸引众多穆斯林青年之时,欧洲各地传统的基督教教堂却信众日减,且多以老年人为主,与人气兴旺的清真寺形成鲜明对照。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本国民众每月到教堂参加礼拜两次及以上的比例仅

为6.3%,而且,由于经常上教堂的信众以老年人为主,该调查预计到2040年,同一比例很可能进一步下降到2%。一些教堂因为门可罗雀,不得不改为非宗教性质的社区中心或商业性的办公室。反之,在英国总人口中仅占3%的穆斯林,定期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数却多于定期去教堂的人数,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伦敦穆斯林经常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数高达80%,有的基督教场所竟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转让”给了伊斯兰机构。<sup>①</sup>

面对欧洲穆斯林社群规模和伊斯兰宗教影响与日俱增,欧洲内外一些人忧心忡忡,甚至恐惧不安。随之,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2004年马德里的“3.11”爆炸案,2005年“7.7”伦敦爆炸案等一连串恐怖事件接连发生,震惊世界。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欧拉伯”和“欧拉伯威胁”论正式出台,并迅速引起欧美舆论的广泛关注。

### 三、“欧拉伯”与“欧拉伯威胁论”

“欧拉伯”(Eurabia)是由英文“欧洲”(Europe)与“阿拉伯”(Arabia)两词组合而成的一个人造词。“欧拉伯”成为具有特定政治意义的概念并引起广泛社会关注,与2005年1月出版的《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以下简称《欧拉伯》)一书密切相关。<sup>②</sup>

《欧拉伯》的作者贝特·叶奥(Bat Ye'or)是一位长期致力于犹太民族政治研究的犹太裔女学者。叶奥的诸多著作,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口诛笔伐,在美国“9.11”事

<sup>①</sup> 详见考克斯新闻社(Cox News Service)2007年12月13日报道:《欧洲空荡荡的教堂与满当当的清真寺》(Empty churches, full mosques in Europe, <http://www.dailycamera.com/news/2007/dec/13/empty-churches-full-mosques-in-europe/>)。

<sup>②</sup> Bat Ye'or, *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 Cranbury, N. 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件发生后,更进一步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大加鞭挞,《欧拉伯》一书由于醒目地将“欧拉伯”定义为一个具有反美、反以特征的地缘政治实体,集中引发了学界、政界的强烈关注与争论。

“欧拉伯”的立论基础是欧洲的人口生态,是对欧洲穆斯林移民社群不断壮大的强烈不满与恐惧。叶奥指出,穆斯林移民不仅源源不断进入欧洲,而且,在欧洲新出生的人口中,穆斯林后裔几乎达到半数,身着长袍头巾的穆斯林已经遍布欧洲大小城区。她建构了“欧拉伯”理念的五大支柱:欧洲人的胆怯与贪婪使之屈从于阿拉伯世界;欧—阿因石油交易而结盟;欧洲人愚蠢地以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可以和平共处;欧洲尤其是德国人内心充满对以色列的仇恨;欧洲与阿拉伯联手旨在与美国争霸。叶奥据此总结道,“欧拉伯”是胆小的欧洲民主派、专横的阿拉伯统治者与胡作非为的伊斯兰恐怖组织之间奇特的结合。

叶奥在指责肮脏的欧拉伯交易时,愤怒批判欧洲的多元文化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现代翻版。她认为,宽容的多元文化政策既为伊斯兰教在欧洲传播敞开方便之门,同时也助长了伊斯兰政治观、价值观在欧洲全面扩散,直接玷污了欧洲的传统文明。她认为,欧洲向阿拉伯臣服的政策,虽然看似满足了欧洲政治家们称霸世界的野心,实际上却导致欧洲社会出现危险的背离欧洲传统的自由民主原则的倾向。用叶奥自己的话说,《欧拉伯》所描述的是近30年来欧洲政治文明的转型,即欧洲如何从具有悠久历史的犹太—基督文明,转变为臣服于伊斯兰强权的后犹太—基督文明,是欧洲的阿拉伯化,甚至是欧洲的伊斯兰化。

“欧拉伯”之说的出现,使欧洲的阿拉伯移民社群及其伊斯兰宗教被严重妖魔化,这有其特定的历史因果关系,涉及欧洲内外多重因素。本文不是对欧阿、欧美关系的全面分析,仅仅着重从与移民治理密切相关的多

元文化主义之实施与影响的角度,略作剖析。

简而言之,“欧拉伯”从反面揭示了欧洲移民政策的严重失误。如前所述,欧洲20世纪60~70年代实施的“客工”制度,以及在该制度影响下确定的以“临时”观为主导的移民政策,长期将移民工人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将外来移民工人当“客工”的潜台词,就是希望他们在做完客之后就打道回府。但是,人口流动并不是任意开关的水龙头。当接纳国想要将“客人”送回去时,却发现客人已经在当地生根:客人们不想回去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迁移地的工作生活;他们也回不去了,因为时过境迁,与原住地已经形成距离,而在迁移地成长的下一代更是对原住地完全陌生。

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工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可以接受低于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可以接受在低于当地工人工资水平的条件下去从事脏、累、险的工作,并且超时超量工作。因为他们潜在的参照系是原住地居民的工资与生活水准,从移入国获得的高于原住地居民的收入,可能使他们在心理上获得向上流动的满足。而且,第一代移民工人往往在当地国社会文化生活中是一个隐形群体,他们大多埋头工作赚钱,对当地国社会文化不熟悉,更缺乏争取自身权益的意识与团体。他们可以接受在家中地下室里悄悄做礼拜,满足于听来自家乡的阿訇在私人场所为其传经布道。当这些外来群体既无经济实力也无政治渠道时,一般连想都不敢想去烦扰政府当局为其提供宗教礼拜的正式场所。因此,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德、法、英、荷等国的当地人看到的,可能是身边的外来移民工人越来越多了,可能是自己孩子的班级上增加了阿拉伯同学,然而,他们不会看到那些在地下室里举行的礼拜,不知道来自中东国家的阿訇在对他们的同胞们说什么,也不去关心穆斯林邻居的精神需求是什么。

在安宁的表象下,20世纪80年代后兴

盛一时的多元文化政策,伴随着移民后裔的成长,使移民“孤岛”的问题慢慢浮出水面。多元文化政策所明确给予外来移民的,是文化上的平等权。具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外来移民们,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可以庆祝自己的节日,更重要的是,当中东阿拉伯国家以石油武器而为自己争得了发展致富的机遇后,他们也拥有了资助国外穆斯林同胞的经济实力。欧洲国家以居高临下的文化宽容,允许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城镇兴建清真寺,于是,原本在地下室做礼拜的穆斯林们纷纷堂而皇之地走入清真寺。令自以为是“主人们”料想不到的是,短短十几年,清真寺竟迅速布满全欧洲,且规模越来越大,标志越来越清晰,影响也越来越广泛。更令主人们想都不敢想的是,伊斯兰教作为穆斯林移民群体的精神支柱,在进入21世纪之后,竟然成为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学者所提出的冷战之后文明冲突的标志之一。

在欧洲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穆斯林,他们所接受的是自由、平等的教育,要求与当地同龄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过和当地人一样的生活。然而,外来移民家庭缺乏当地社会资本支持的现实,加之当地社会主流话语中若隐若现的差别对待,以居高临下态势出现的“关怀”或“恩惠”,则激起年轻一代移民后裔的不满,并且将他们推向了主流社会的对立面。理想中的自由、平等理念和遭受社会排斥的生活现实相互碰撞,转而向与生俱来的伊斯兰教信仰寻求精神支柱,这应当是当今依然生活在欧洲底层的年轻穆斯林群体具有共性的生存状态。

在穆斯林移民后裔回归伊斯兰的趋势下,又出现进一步分化。信奉传统伊斯兰教的人崇尚和平友爱,鄙视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拒绝与没落的“西方社会”同流合污,他们强化自身的宗教文化认同,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但少部分人则因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滋生强烈不满,传统的伊斯兰教无法平息他们内心深处的躁动,此时,

某些特定事件的刺激或极端主义的蛊惑,就可能引诱其走向人类社会的对立面。他们穿起长袍,蓄起胡须,以反社会行为证明自己的“不凡”,发泄不满,如果被极端主义组织所控制,就可能由仇恨而疯狂而丧失理智。美国皮尤中心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虽然约2/3的穆斯林反对针对平民的自杀性袭击,但几乎每6名穆斯林中仍有一人认为“为了捍卫伊斯兰而对平民进行自杀性攻击基本上是正当的”。<sup>①</sup>

“欧拉伯”之说抓住以上这些现象,将其推到极致,演绎出了骇人听闻的现象。“欧拉伯”的支持者将欧洲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伊斯兰在欧洲的影响,尤其是伴随着阿拉伯移民在欧洲中心城市立足而形成以清真寺为表征的阿拉伯社区问题,统统推上了冷战之后所谓“文明冲突”之国际政治的层面。“欧拉伯”之说流行的背后,反映了当前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发人深省的政治动向,即认为伊斯兰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价值观最主要的威胁,欧美社会的右翼势力更以此作为要挟欧洲彻底放弃温和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利剑。

在此大背景下,欧洲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数量众多的荷兰、丹麦、法国、英国等,近年来相继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多元文化政策,转而强调国民在文化与认同上的一致性。如前所述,20世纪80~90年代,西欧在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时,曾经由国家提供资助,在当地电台、电视台给出专门时段,播送不同民族语言的节目,或是为移民族群社团、学校活动提供资助,但近年来此类政策均已被撤销,少部分靠本族群社团自筹资金延续的活动,也需接受政府的时间、规模、内容等多方面的严格限制。欧洲国家强调统一文化

<sup>①</sup> PRCP (Pew Research Center Project), 2006, “The Great Divide: How Westerners and Muslims View Each Other”, <http://pewglobal.org/reports/pdf/253.pdf>.

认同观的政策,还突出地表现在相关国家针对外来移民的入籍政策方面。英、荷政府都已明确规定,申请加入当地国籍者除了需要符合关于移民入籍的年龄、学历、居住年限和经济能力等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参加包括当土语言、历史、文化习俗等内容的考试,只有顺利通过文化考试者,其申请方能被接纳。同时,欧洲国家也对建造新的清真寺严格限制,例如,2009年11月,瑞士通过公民投票,禁止当地穆斯林社群继续修建宣礼塔。<sup>①</sup>

#### 四、思考与启示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需要以统一的国策凝聚力量形成合力。西欧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演变值得我们深思。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同文化一律平等,鼓励不同民族展示并弘扬本民族文化,使社会更加丰富多彩。然而,西方社会实施多元文化30年的实践表明:标榜宽容的多元文化政策,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第一,错综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绝不可能指望以表面上的“文化平等”而自然消弭。多元文化政策强调给予不同文化以“自由展示”的机会,并由政府提供经济支持以“扶持发展”。但与此同时,其潜在的功能则是固化、强化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因为不可能既在宏观层面上主张保留并展示差异以标榜文化多元,又希望民众能对不同文化一视同仁;不可能既强调不同族群各自保持其文化传统的必要性,又要求民众完全摒弃对不同文化的歧义。从欢迎穆斯林“客工”之开放多元的姿态,到以骇人听闻的“欧拉伯威胁论”警醒世人,其表面巨大差异的背后,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不过是“披上美丽外衣的种族主义”与“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之别。换言之,即便在多元文化政策推行之时,一些主要倡导者的骨子里也并未真正根除对异民族的隔阂与排斥,因而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就可能迅

速转向另一极端。

第二,在多元文化政策引导下,原本可能被淡化、忘却的民族或文化“特性”,却在被施以恩惠的同时从正反两面重新突显,进而可能被某些极端分子利用而成为组织帮派的“合法”武器。以“照顾”方式居高临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往往导致“被照顾者”因屈辱而不满,因弱势而对立。一些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在“照顾性”的多元文化政策之下,可能成为特定文化场景中的“多数”或“主体”,然而,这种处于被欣赏之下的主体地位,不仅不会是平等的象征,而且可能使其感受到一种特别的耻辱。多元文化主义之下实施的权力机构中代表机制的双重标准等政策,或许一时可能激励少数民族和外来族群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但是从长远看,一个统一的社会将可能因次级群体利益突显而分化,严重者甚至可能驱使国家走向实质上的分裂。欧洲穆斯林移民第二、三代对主流社会态度的演变,即为明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元文化主义所描绘的是一种“理想类型”,在现实社会中其实难觅其踪。因为不同社群之间无论是经济基础的厚薄,获取社会资源的多少,或是既有社会资本的强弱,都不可能通过“文化平等”消弭障碍,达到和谐,更何况多元文化政策下的文化展示往往会成为强势群体眼中的另一种文化消费。

(责任编辑:乔燕)

<sup>①</sup> 根据《华盛顿邮报》2009年11月30日报道,在“是否允许穆斯林继续修建宣礼塔”的公投中,57.5%的瑞士人投票支持政府禁止修建宣礼塔。